

试论中国对第二次亚非会议政策的演变

李潜虞

内容提要 中国参与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历史过程分为会议筹备的初始阶段、会议筹备的高潮阶段、危机处理阶段和促使会议无果而终阶段。在上述过程中,中国一方面坚决反对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另一方面反对第二次亚非会议与联合国挂钩,提出南越等七个“傀儡政权”都不能出席会议,还要求点名批评美国。总体上看,中国对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政策体现了反帝与反修并重的特色。

关键词 中国政治与外交 第二次亚非会议 反帝 反修

第二次亚非会议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际政治的一个热点,也是中国外交工作的一个重点。中国曾采取多项外交行动,以期会议的发展方向符合中国的总体外交战略。本文旨在根据外交部新开放档案,并结合其他一些国家公布的档案资料,描述中国对第二次亚非会议政策演变的过程,并初步分析背后的原因。

中国参与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历史过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会议筹备的初始阶段(1964年4月10日—1965年2月8日);(2)会议筹备的高潮阶段(1965年2月8日—6月19日);(3)危机处理阶段(1965年6月19日—6月30日);(4)促使会议无果而终的阶段(1965年7月1日—11月2日)。从总体上讲,中国的政策不断强硬,即“反修”寸步不让,“反帝”逐步升级。在前三个阶段,中国积极

* 李潜虞: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100871)

** 感谢牛军教授和《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对文章提出的修改意见。

支持会议召开,在第四阶段,由于中国的政策得不到其他亚非国家的支持,中国最终决定不参加会议。

一、会议筹备的初始阶段 (1964年4月10日—1965年2月8日)

万隆会议的巨大成功使得许多亚非国家都希望能够尽早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筹备会议直到1964年4月10日才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召开,会议通过的《最后公报》规定:“第二次亚非会议应于1965年3月10日由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一级在非洲举行;担任会议东道主的政府由非洲统一组织选定。”^①第二次亚非会议才被真正提上议事日程。

中国最初决定积极参与会议筹备工作,政策初步体现出“反帝反修并重”的特点。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持续紧张,中国在亚非国家贯彻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希望第二次亚非会议成为一个“审判美帝的讲坛”。^②同时,中国认为苏联推行的是与美国合作主宰世界,反对亚非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的错误政策,因此坚决反对苏联介入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后,中国积极支持反帝态度较为坚决的阿尔及利亚担任会议的东道国,同时,向亚非国家反复阐明反对苏联与会的立场。中国虽然大力推动会议的按期召开,但由于东道国提出会场建设困难,中国只得接受了会议首次延期的建议。

1964年5月下旬,中国在获悉阿尔及利亚有意主办第二次亚非会议后,即表示支持,并提出“如果有什么困难,中国愿意尽力帮助解决。”^③7月21日,第二次非洲首脑会议正式决定由阿尔及利亚担任第二次亚非会议的东道国。8月11日,中国外长陈毅向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提出,中国将向阿提供400万美元的现汇,以帮助阿建设会议场馆。^④

中国之所以支持阿尔及利亚作为第二次亚非会议的东道国有两点原因:首先,基于自身革命的经验,中国对阿尔及利亚通过武装斗争获得民族独立的道路给予高度认同和赞赏。陈毅曾提出:非洲国家“要走阿尔及利亚的道路”。^⑤其次,中国

① 《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最后公报》,《人民日报》1964年4月17日第1版。

② 《阿尔及利亚政变前有关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外交通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7-00933-01,起止日期:1964年11月7日—1965年6月19日。

③ 《关于支持第二次亚非会议在阿尔及利亚举行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7-00932-04,起止日期:1964年4月7日—1964年10月4日。

④ 《陈毅副总理与阿尔及利亚大使亚拉谈有关国际和地区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6-01144-05,起止日期:1964年8月11日—1964年8月11日。

⑤ 《陈毅副总理及夫人张茜接见阿尔及利亚烈士子女休假团谈话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7-00840-07,起止日期:1964年8月22日—1964年8月22日。

支持阿尔及利亚担任东道国也有更为现实的战略考虑。60年代中期,刚刚独立的阿尔及利亚正在支持反对刚果冲伯政权的武装斗争。越南战争使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压力再次加大。中国认为刚果(利)^①的武装斗争可以分散美国力量,减轻中国压力,因此决定通过阿尔及利亚支持刚果(利)的武装斗争。1964年8月6日,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时明确谈到了这种战略考虑,他说:“如果非洲多几个刚果,亚洲多几个南越,拉丁美洲多几个古巴,那美国就是十个指头分散在十个地方,就可以一个一个地切断它。”^②同年11月,陈毅在访问阿尔及利亚期间多次提出向阿提供飞机或船只,以便向刚果(利)运送武器。^③后经外交部统计,截止到1965年2月,中国向阿尔及利亚运送了可以装备三千人的轻武器,希望其转运刚果(利)。^④

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一直将挤进第二次亚非会议作为对中国的回击。在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期间,苏联就曾向亚非国家散发声明,积极要求参加会议,指责中国反对苏联与会的立场。^⑤印度在筹备会议期间也提出邀请苏联,但遭到中国的坚决反对。会议公报最后只是笼统地表示对这一问题“没有能够得出一致意见”。^⑥10月20日,由15个亚非国家驻阿尔及利亚大使组成的常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常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筹备工作正式启动。中国担心印度等国利用常委会做出邀请苏联参加的决定,因此指示参加常委会工作的中国大使曾涛,尽量缩小常委会的权力,因为常委会权力过大,会给一些国家造成修改邀请范围和会议议程的机会。^⑦其次,要求常委会必须坚持协商一致的原则,坚决反对多数表决制。^⑧其目的是防止印度等国利用常委会以多数表决的方式做出邀请苏联参会的决定。

1964年10月25日至12月8日,陈毅先后访问了巴基斯坦、阿尔及利亚、埃及、柬埔寨、印尼和缅甸,这次出访成为中国阐述相关政策的机会。陈毅提出,第二

① 今刚果(金)。

② 《周恩来总理会见阿尔及利亚大使亚拉谈话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6-01448-02,起止日期:1964年8月6日—1964年8月6日。

③ 《陈毅副总理与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会谈记录、两次会谈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203-00588-04,起止日期:1964年10月31日—1964年11月7日;《陈毅副总理与阿尔及利亚议长本·阿拉谈话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203-00588-03,起止日期:1964年11月4日—1964年11月4日。

④ 《接待阿尔及利亚国务部长比塔特访华的有关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7-00937-02,起止日期:1965年8月12日—1965年8月26日。

⑤ 夏明星、苏振兰:《中苏角力第二次亚非会议》,《党史博采》2009年第1期,第32—36页。

⑥ 《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最后公报》,《人民日报》1964年4月17日第1版。

⑦ 《有关第二次亚非会议常设委员会几个问题的请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7-00933-02,起止日期:1964年7月25日—1964年9月22日。

⑧ 《第二次亚非会议第一至第七次常委会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7-00933-03,起止日期:1964年10月7日—1965年6月9日。

次亚非会议应该在反帝反殖方面比第二次不结盟会议更进一步。10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一些亚非国家希望中苏关系出现缓和,从而改变中国反对苏联参会的立场。在访问中,陈毅表示无论苏联领导层如何变换,中国的立场都不会改变。

11月4日,在与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会谈时,陈毅提出“第二次亚非会议应该在反帝反殖方面更进一步,应该制定一个反帝反殖的纲领”。针对苏联参加会议问题,陈毅说:“我们不主张苏联参加是一贯的。只有亚非国家才能参加亚非会议。不能根据爱好,喜欢谁就让谁参加,不喜欢谁就不让谁参加。不能拿原则做交易。”^①

由于南越是万隆会议的参加国,根据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最后公报》,会议的邀请国应包括“曾参加万隆会议的所有二十九个亚非国家”,^②而此时,“北部湾”事件发生不久,越南战场的形势还很不明朗。因此,对于南越政权参加会议问题,陈毅显示出了一定的灵活性,他表示:“这个问题应留给外长会议再谈。不要因这个问题影响第二次亚非会议。越南问题须靠战斗解决,而不取决于第二次亚非会议。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如能参加会议将是一大进展,但并不能决定局势。”^③

12月1日,陈毅在与印尼第一副总理兼外长苏班德里约会谈时也强调第二次亚非会议应该把反帝反殖旗帜举得更高,并表示,对苏联参会问题“不好让步”。^④

就在陈毅穿梭于亚非国家之时,作为东道主的阿尔及利亚实际上已经决定延期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1964年11月23日,回国述职的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亚拉向中国驻阿大使曾涛表示,本·贝拉决定派遣一名部长访华,但他并没有透露此行的目的。而实际上,本·贝拉派遣特使就是要商谈第二次亚非会议延期举行的问题。12月7日,本·贝拉向中方提出由于会场不能按期完工,准备派旅游部长乌兹加尼访问中国和印尼,商谈会议延期举行问题。^⑤

12月16日,周恩来和陈毅共同会见了来华访问的乌兹加尼。乌兹加尼首先为会议延期寻找托词,但遭到周恩来的驳斥。乌兹加尼只得承认,推迟会期实质是

^① 《陈毅副总理与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会谈记录、两次会谈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203-00588-04,起止日期:1964年10月31日—1964年11月7日。

^② 《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最后公报》,《人民日报》1964年4月17日第1版。

^③ 《陈毅副总理与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会谈记录、两次会谈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203-00588-04,起止日期:1964年10月31日—1964年11月7日。

^④ 《陈毅副总理同印尼第二副首席部长苏班德里约第二次会谈记录(谈第二次亚非会议问题、全面禁核销核问题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203-00592-05,起止日期:1964年12月1日—1964年12月1日。

^⑤ 《阿尔及利亚总统特使乌兹加尼旅游部长访华往来电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204-01054-02,起止日期:1964年11月24日—1964年12月16日。

因为会场建设遇到困难。由于问题重大,中国将乌兹加尼的解释和中方对延期的态度整理成了书面材料。书面材料首先明确指出:会议推迟举行“纯粹是工程技术原因,并无任何其他原因”,对于延期,中国政府不便先表示同意,但如果印尼同意把会议推迟到1965年4月初,则中国政府可以支持阿尔及利亚和印尼取得的一致意见。^① 这样的表述说明中国实际上已经被迫接受了第二次亚非会议首次延期的提议。

经过与中国和印尼多次协商,阿方终于确定了会议新的日期。1965年2月8日召开的第四次常委会宣布,第二次亚非会议推迟到1965年6月29日举行。

二、会议筹备的高潮阶段(1965年2月8日—6月19日)

在本阶段,中国的政策更趋强硬,主要表现在反对苏联参会方面不做丝毫妥协的同时,进一步提出反对联合国与会,支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参会,反对邀请拉美国作为观察员,点名谴责美国等条件,并最终提出南越、南朝鲜等七个政权均不能参加会议。中国对第二次亚非会议反帝反修并重的政策在这一阶段形成。为实现上述政策目标,周恩来、陈毅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八轮密集的外交活动。

1965年2月9日,阿尔及利亚新闻界报道了阿外长邀请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大主席出席会议的消息。新中国自建立以来长期被排斥在联合国以外,此时中国正希望通过第二次亚非会议迫使联合国改组,而阿尔及利亚对联合国的邀请干扰了中国这一战略目标,中国不得不做出强烈反应。

2月13日,外交部要求中国大使曾涛立即约见阿外交部高级官员,表达对阿邀请联合国官员出席会议的关切。^② 同日,陈毅还召见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亚拉,阐明中国反对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大主席以任何身份出席会议的立场。^③ 2月17日,曾涛约见了阿外交部高级官员。后者向曾涛确认,阿外长确实已邀请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大主席。鉴于事态严重,外交部2月23日要求曾涛约见本·贝拉,并拟定了长篇说帖,其主要内容是:亚非会议不与联合国发生任何联系是从万隆会议开始就明确的原则。如果邀请联合国的代表人物出席,会为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破坏会议开方便之门。吴丹和奎森—萨基虽然是亚洲和非洲人,但他们的身份是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大主席,他们的言行是代表联合国的。第二次亚非会议的邀请范

^① 《阿尔及利亚特使乌兹加尼访华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7-00932-02,起止日期:1964年12月20日—1964年12月30日。

^② 《中国反对阿尔及利亚邀请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大主席等人以观察员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7-00636-03,起止日期:1965年2月9日—1965年2月13日。

^③ 《陈毅外长与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亚拉的谈话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7-01088-01,起止日期:1965年2月13日—1965年2月13日。

围是由雅加达筹备会议确定的,任何国家无权采取片面行动,改变筹备会议的决定。2月25日,曾涛约见了本·贝拉,并逐点阐述中国立场。本·贝拉只是含糊表示,阿政府对此问题还没有正式决定,他将和外长共同设法使吴丹和奎森—萨基不来出席会议。^① 以上是中国针对第二次亚非会议进行的第一轮外交活动。

1965年3月22日至4月4日,周恩来在前往罗马尼亚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后,访问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埃及、巴基斯坦和缅甸。与此同时,陈毅也出访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尼泊尔三国。这两次出访成为中国进行的第二轮外交活动。

3月30日至31日,周恩来顺访阿尔及利亚并与本·贝拉进行了三次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主要阐述了对越南战争形势的看法,特别是介绍了中苏两国在援越方面的分歧。其意在于表示中苏分歧是本质性的,不存在缓和的余地。对于第二次亚非会议,周恩来提出四点意见:(1)中方完全支持新的会议日期;(2)坚持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原则;(3)雅加达筹备会议的决定是筹备工作的根据,如各国有新提议,只能在外长会议上去提;(4)反对苏联参加会议。周恩来表示,如果苏联参加会议,就会把中苏争论带到会议上来,那样只会削弱会议,对第二次亚非会议不利。周恩来还指出,亚非国家的问题只要有联合国的干预,就不会有好结果,并请本·贝拉慎重处理对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大主席的邀请。^②

4月1日,周恩来又赶到开罗与纳赛尔举行会谈。会谈中,周恩来着重阐述了亚非国家在反帝斗争中可能出现分化的问题。他指出,一部分人发生动摇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主张反帝的国家是否能高举反帝旗帜斗争下去。只要坚决反帝的国家能坚持下去,中间派是会跟过来的。^③ 这显然是在提醒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继续走反帝斗争的道路。4月2日至4日,周恩来在与巴基斯坦外长布托、总统阿尤布·汗及缅甸领导人奈温举行会谈时,再次强调了对本·贝拉所谈及的四点意见。^④

陈毅在访问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尼泊尔过程中重点阐述了中国反对苏联参会的立场。陈毅指出,苏联不是亚非国家,中苏关系的起伏并不是中国反对苏联与会的原因。^⑤ 苏联新领导上台后,仍旧执行的是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平共处的错

① 《中国就反对阿尔及利亚邀请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等人以观察员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做阿工作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7-00636-02,起止日期:1965年2月17日—1965年2月26日。

② 《周恩来总理与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三次会谈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203-00651-02,起止日期:1965年3月30日—1965年3月31日。

③ 《周恩来总理与阿联总统纳赛尔会谈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203-00652-02,起止日期:1965年4月1日—1965年4月1日。

④ 《周恩来总理顺访巴基斯坦(同巴总统阿尤布汗和外长布托会谈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203-00659-01,起止日期:1965年4月2日—1965年4月2日;《周恩来总理与缅甸主席奈温会谈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7-00933-04,起止日期:1965年4月4日—1965年4月4日。

⑤ 《陈毅副总理与阿富汗领导人会谈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6-01267-06,起止日期:1965年3月23日—1965年3月24日。

误政策。^①除此之外,陈毅还明确了反对南越政权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态度。^②中国态度的变化是因为1964年12月底,中、朝、越三国副外长就第二次亚非会议问题召开了会议,确定了反对南越政权参加的方针。^③

在结束了欧、亚、非六国之行程仅仅十天之后,4月16日,周恩来又与陈毅前往印尼出席万隆会议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为了补救第二次亚非会议延期举行所造成的损失,中国大力支持这次庆祝活动。中国一方面积极推动亚非国家首脑前来参加活动,共有36个亚非国家的代表出席,^④使得这次庆祝活动实际上又成为一次非正式的亚非会议。另一方面,周恩来、陈毅与亚非国家领导人广泛接触,阐述中国的相关政策。周恩来还特别赞扬苏加诺反帝调子很高的讲话是“为第二次亚非会议奠定了政治方向”。^⑤这是中国进行的第三轮外交活动。

1965年5月间,又传出阿尔及利亚拟邀请拉丁美洲和欧洲国家作为观察员的消息。中国担心在中苏分歧中已经选择站在苏联一边的古巴和东欧国家以观察员身份与会,将使苏联得以渗透到会议之中。5月18日,周恩来就观察员问题致信本·贝拉。周恩来表示:“亚非会议是亚非国家的会议,把观察员的范围也限于亚非地区,这是理所当然的。我认为,在考虑邀请观察员问题的时候,同邀请正式参加国一样,只能以雅加达会议最后公报的规定为准。”^⑥5月28日,中国大使曾涛亲自向本·贝拉递交了信件,并再次表明中方的立场。^⑦这是中国开展的第四轮外交活动。

为与印尼协调政策,中国邀请印尼第一副总理兼外长苏班德里约来华商谈。苏班德里约于5月28日抵达广州,从当天下午到第二天早晨,周恩来、陈毅几乎是彻夜不眠地与苏班德里约连续进行了三次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再次对亚非国家出现分化表示担忧,^⑧原因是4月份非洲与马尔加什共同组织成员国抵制第二

① 《陈毅副总理访问尼泊尔:会见尼国王、首相、外交大臣谈话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203-00656-01,起止日期:1965年3月30日—1965年3月31日。

② 《陈毅副总理与阿富汗领导人会谈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6-01267-06,起止日期:1965年3月23日—1965年3月24日。

③ 《第二次亚非会议第一至第七次常委会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7-00933-03,起止日期:1964年10月7日—1965年6月9日。

④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61页。

⑤ 《关于庆祝万隆会议10周年情况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6-01272-04,起止日期:1965年4月30日—1965年5月17日。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730页。

⑦ 《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向本·贝拉总统递交周恩来总理信时谈话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7-00636-06,起止日期:1965年5月28日—1965年5月28日。

⑧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457页。

次亚非会议。周恩来还谈到：“我们面临着—场很大的斗争。这场斗争不仅是在亚非内部，而且还是在联合国外面的一场大斗争。”^①这也表明，中国有通过第二次亚非会议在联合国外“另起炉灶”的战略构想。这次会晤是中国进行的第五轮外交活动。

5月底至6月中旬，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访问摩洛哥、几内亚、马里、加纳、刚果（布）和中非等6个非洲国家，向他们介绍中国对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政策。从6月1日开始，周恩来出访巴基斯坦和坦桑尼亚，这已经是短短三个月内周恩来对亚非国家的第三次访问。姬鹏飞和周恩来的出访是中国开展的第六轮外交活动。

在访问中，姬鹏飞提出第二次亚非会议在政治上反帝基调应该比万隆会议更高，在经济上要强调防止新殖民主义的渗入。^②姬鹏飞还谈到，如果苏联参会，会把和平共处、裁军等问题带到会议上来，从而混淆会议反帝反殖的目标。姬鹏飞明确表示中国反对南越、冲伯政权、南非和马来西亚参加会议。他还提出第二次亚非会议是对每个国家反帝态度的考验。如果与会国很多，但不反帝，这样的团结是靠不住的。会议成功的标准就是能否组成国际反帝统一战线。^③从这些谈话可以看出，中国关注的并不是与会国的多少，而是会议反帝调门的高低。这恰恰成为中国与很多亚非国家之间的一个最主要的分歧。

周恩来出访巴基斯坦和坦桑尼亚期间，正值越南战争不断升级。中国再次强化了亚非国家的反帝斗争是相互支持的这一战略思考，认为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和第二次亚非会议可以相互呼应、互相支援。周恩来在坦桑尼亚的群众大会上指出：在当前新的斗争形势下，特别是当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已经走上了战争挑衅的冒险道路的时候，亚非各国有必要进一步团结起来，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为维护 and 争取民族独立而共同斗争。因此，开好第二次亚非会议，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④这表明，中国希望形成一种会议与反帝斗争相互促进的局面。

6月初，阿尔及利亚派遣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亚齐德访问中国，协调双方立场。周恩来和陈毅分别会见了亚齐德。在会谈中，中国突出“点名反美”、“一揽子解决”、“批评修正主义反对苏联与会”三点立场。中国的政策清晰地呈现出“反帝反修两面出击”的特色，中国对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强硬立场也最终形成。接待亚齐德访华成为中国进行的第七轮外交活动。

亚齐德前来中国时，周恩来已经出发访问巴基斯坦和坦桑尼亚。6月2日上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33页。

② 《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访问摩洛哥与摩外交副国务大臣夏非谈话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7-01091-05，起止日期：1965年5月24日—1965年5月24日。

③ 《姬鹏飞副外长同马里总统凯塔谈话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6-01268-05，起止日期：1965年6月2日—1965年6月2日。

④ 《在达累斯萨拉姆群众大会上尼雷尔总统和周恩来总理的讲话》，《人民日报》1965年6月7日第3版。

午,双方在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举行了短暂的会见。周恩来在会见中提出两点意见:(1)凡是亚非范围以外的,不论是国家、团体或个人,都不能作为第二次亚非会议的观察员,他们只能作为东道主本·贝拉总统个人的客人来观礼。(2)南非、以色列、冲伯政府、蒋介石政权、南越西贡政府、马来西亚和南朝鲜均不能参加会议。^①第一条等于重申反对苏联、东欧和拉美国家以任何名义参加会议,而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大主席只能作为东道主的客人前来观礼。第二条就是所谓的“一揽子解决”,即中国当时认定的七个反人民的傀儡政权均不得参加会议。

亚齐德到达北京后,陈毅于6月4日、5日和8日与他连续进行了5次会谈。在6月5日的会谈中,陈毅全面阐述了中国对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立场。他指出:“如果第二次亚非会议不谴责美帝,那就是后退。”他还谈到,在第二次亚非会议上,中国必须提出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等问题上的正确主张,这样就等于不指名地批评了修正主义的错误观点。陈毅还特别强调,如果会议变成一个没有原则的俱乐部,即使能达成协议也软弱无力,调子还不如第二次不结盟会议高,这将是最大的失败。他还重申对七个傀儡政权“不论是一起审查或逐个审查,一揽子解决一律不准参加会议”,并再次表明中国反对苏联与会。^②亚齐德访问结束后,中国外交部还将陈毅的表态整理成《关于第二次亚非会议问题给阿尔及利亚总统特使亚齐德的备忘录》。《备忘录》指出,“指名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将成为“第二次亚非会议比万隆会议前进一步的主要标志”。“我们并无意破坏亚非一些国家和美国的关系,问题是要对美帝施加压力,不能退让和迁就。越退让迁就,美帝就越猖狂,事情就越难办。”《备忘录》还重申了“一揽子解决”和反对苏联参会的立场。^③至此中国对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政策基本形成。

随着会期的临近,中国为会议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战”,这也是“6·19”政变前中国进行的最后一轮外交攻势。6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长篇评论员文章《苏联没有资格参加亚非会议》,文章指出,苏联不是一个亚洲国家,还驳斥了苏联要求参加会议的种种借口,并最终表示,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决不让步,决不妥协”。^④同日的《人民日报》还报道,八个非洲民族主义组织和印尼、日本、越南南方和中国驻亚非人民团结组织的代表签署联合声明,要求第二次亚非会议坚持协商一致的原则。^⑤中国报道这一消息,仍意在反对任何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让

① 《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接见阿尔及利亚总统特使亚齐德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7-00927-06,起止日期:1965年6月1日—1965年6月13日。

② 《陈毅外长与阿尔及利亚总统特使亚齐德会谈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7-00927-03,起止日期:1965年6月4日—1965年6月8日。

③ 《关于第二次亚非会议问题给阿尔及利亚总统特使亚齐德的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7-00927-04,起止日期:1965年6月8日—1965年6月8日。

④ 观察家:《苏联没有资格参加亚非会议》,《人民日报》1965年6月18日第1版。

⑤ 《第二次亚非会议必须坚持协商一致原则》,《人民日报》1965年6月18日第3版。

苏联挤进会议的企图。19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对外联络委员会主任宣布只有民族解放阵线才有资格代表越南南方参加会议的消息,^①并全文刊登了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关于在第二次亚非会议上越南南方代表权问题的《备忘录》。《备忘录》指出民族解放阵线才是越南南方的真正代表。^②为了配合《备忘录》的发表,20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长篇社论,支持民族解放阵线的立场。^③

就在中国的宣传攻势展开之际,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也于6月18日启程前往埃及进行友好访问并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然而突如其来的变故再次打断了会议的进程。

三、危机处理阶段(1965年6月19日—6月30日)

1965年6月19日清晨,阿尔及利亚国防部长布迈丁发动政变,逮捕了总统本·贝拉,成立了以布迈丁为首的革命委员会。出于尽快组织一个反美论坛的需要,中国对“6·19”政变采取了不干涉的态度,支持第二次亚非会议如期召开。然而,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中国的政策由积极要求如期开会转变为观望,再转变为支持会议再次延期,经历了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

周恩来是在去埃及的专机上获悉政变消息的。由于没有得到国内的明确指示,他在6月19日抵达开罗后与埃及总理萨布里会谈时表现得非常谨慎,主要是听取埃及方面介绍有关阿尔及利亚政变的情况,未对是否如期开会做出明确表态。^④

此时中国国内的意见是阿尔及利亚政变是阿内政,第二次亚非会议仍应如期举行。6月20日,中国副外长曾涌泉会见了阿尔及利亚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并做了以下三点表示:(1)“6·19”政变是阿国内事务,中国对任何国家的内部事务一贯采取不干涉的态度;(2)中国积极支持第二次亚非会议如期举行;(3)中国希望中阿两国的友好关系继续发展。^⑤这样的表态等于认可了布迈丁新政权。同日下午19时,外交部要求曾涛约见布迈丁,转达上述立场,同时也将这些立场转告了周恩

① 《只有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才有充分资格参加亚非会议》,《人民日报》1965年6月19日第1版。

②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关于第二次亚非会议上越南南方代表权问题的备忘录》,《人民日报》1965年6月19日第3版。

③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是南越人民的唯一代表》,《人民日报》1965年6月20日第1版。

④ 《周恩来会见埃及总理萨布里谈阿尔及利亚政变、越南局势等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7-01081-05,起止日期:1965年6月19日—1965年6月19日。

⑤ 《曾涌泉副外长与阿尔及利亚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的谈话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7-00936-01,起止日期:1965年6月20日—1965年6月20日。

来。曾涛立即约见了布迈丁,布迈丁表示将努力进行准备,如期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①当天下午,常委会还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决定第二次亚非会议仍按原定日期举行。^②当天晚上,阿尔及利亚外长布特弗利卡也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会议召开的条件已经具备,会议可以成功举行。^③

6月20日当地时间上午11时,周恩来与埃及总统纳赛尔、副总统阿密尔举行了第一次会谈。纳赛尔表示要派阿密尔去阿了解情况。在会谈中,周恩来表示:“关于亚非会议问题,我们还要考虑,还要同我国政府和党中央商量。但我们的基本思想是应该开。”同时,他希望纳赛尔在未与更多国家商量之前,不要急于表态。纳赛尔对此表示同意。^④由于北京与开罗有6个小时时差,北京20日19时发出的电报应在开罗当地时间下午13时以后送达周恩来。因此,周恩来应该是在与纳赛尔会谈后收到电报的。由于在会谈中埃双方已商定对是否如期开会暂不表态,而国内19时发出的电报又表明中国已决定支持如期开会。因此,周恩来在会谈后致电中共中央表示:“目前以派章汉夫率代表团一批先遣人员去阿尔及尔为好。以此行动间接表示我们对新领导的支持。”^⑤

然而,中国国内所采取的行动对周恩来的态度毕竟有所影响。20日晚,在纳赛尔举行的国宴上,周恩来发表讲话指出:“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召开。我们的态度是积极的。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⑥周恩来的上述表态已经较前积极,这应该是受到中国国内决策的影响。

6月21日,中国外交部领导分别约见了21个亚非国家的驻华使节,通知他们中国主张如期开会的立场。外交部还要求中国驻亚非各国使节向驻在国领导人说明中国的态度,希望他们如期与会。^⑦同日,中共中央也正式致电周恩来:“我在对外活动中,仍主张如期召开亚非会议。”^⑧21日,正在伦敦出席英联邦国家首脑会议的13个亚非国家要求延期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该事件引起了中国的高度关注。当天午夜,外交部要求中国驻英代办熊向晖紧急约见巴基斯坦、加纳、坦桑尼亚、肯

① 《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约见阿领导人布迈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7-01082-01,起止日期:1965年6月20日—1965年6月20日。

② 曾涛:《第二次亚非会议为何没有开成:30年前我亲身经历的往事》,《国际问题研究》1996年第1期,第55页。

③ *Incoming Telegram from American Embassy Algiers to Department of State 3235, June 21, 1965, RG 59, 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 Central Foreign Policy Files 1964-1966, Political & Defense, Political Affairs & Relations, Box 1826, 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 College Park, MD.*

④ 《周恩来总理同阿联总统纳赛尔就阿尔及利亚政变、亚非会议等问题进行会谈的谈话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7-01081-06,起止日期:1965年6月20日—1965年6月20日。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38页。

⑥ 《在纳赛尔总统举行的盛大国宴上纳赛尔总统和周恩来总理的讲话》,《人民日报》1965年6月22日第3版。

⑦ 曾涛:《第二次亚非会议为何没有开成:30年前我亲身经历的往事》,第55页。

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38页。

尼亚、乌干达的首脑或外长,敦促他们如期去阿开会,并请他们推动英联邦另外8个亚非成员国如期与会。^①

21日,周恩来与纳赛尔举行了两次会谈。在上午11时举行的会谈中,纳赛尔对周恩来表示,他已经收到了副总统阿密尔从阿尔及利亚传回的情报,阿局势基本稳定。^②在当天晚上9时30分举行的会谈中,去阿尔及利亚探听消息的阿密尔已赶回开罗,纳赛尔与他一起会见了周恩来。阿密尔向周恩来介绍,阿尔及利亚军队对推翻本·贝拉在意见上完全一致,阿新政权没有受到严重的抵抗。埃及介绍的情况对周恩来的态度有很大影响,再加上国内已有明确指示,因此,周恩来在会谈中明确表示应如期开会,双方还谈到了英联邦亚非国家提出延期开会的问题。周恩来表示,中国可以推动在伦敦的一些亚非首脑如期与会。最终,中埃双方决定努力促使第二次亚非会议如期召开。^③

英联邦亚非国家要求延期是会议按时召开面临的障碍,而熊向晖敦促这些国家如期与会的努力又没有取得成功。这就出现了6月22日一天之内,周恩来连续三次吁请亚非国家按时与会的情况。首先,周恩来与陈毅联名致电与中国建交的亚非国家的首脑或外长,表示中国支持常委会做出的第二次亚非会议如期举行的决定,并希望亚非各国外长能及时到达阿尔及尔出席外长会议。^④同时,周恩来又致电15个和自己较为熟悉的亚非国家首脑,电文说:“中国政府和阿联政府积极支持第二次亚非会议在阿尔及尔举行。我热切地希望贵国政府能够和中国及阿联政府采取联合行动。我还希望阁下能够影响其他亚非国家,使他们参与到联合行动之中。”^⑤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举行答谢宴会时又发表讲话表示,中国政府完全支持如期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并且热诚希望亚非国家将通力合作,使这次会议不仅如期召开,而且能够开好。^⑥

23日凌晨,周恩来会见了阿尔及利亚外长布特弗利卡。后者一改以往的坚决态度,表示会议遇到了困难。在周恩来重申了对“6·19”政变采取不干涉的态度,并表示“第二次亚非会议应该开成,开好”之后,布特弗利卡又说“我们将尽最大的

① 熊向晖:《从第二次亚非会议搁浅看周恩来光明磊落的外交风格》,本书编委会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四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69页。

② 《周恩来总理同阿联总统纳赛尔就阿尔及利亚局势、阿联经济等问题进行会谈的谈话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7-01081-10,起止日期:1965年6月21日—1965年6月21日。

③ 《周恩来总理同阿联总统纳赛尔就阿尔及利亚内部局势、亚非会议日期等进行会谈的谈话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7-01081-09,起止日期:1965年6月21日—1965年6月21日。

④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致亚非国家首脑、外长电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7-01082-03,起止日期:1965年6月22日—1965年6月23日。

⑤ *English Version of the Letter, Zhou Enlai to Osagyafu Kwame Nkrumah, June 22 1965, FO 371/184299,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Public Records Office.*

⑥ 《在周恩来总理举行的答谢宴会上周恩来总理和纳赛尔总统的讲话》,《人民日报》1965年6月24日第2版。

努力使之成功”。^① 阿尔及利亚的态度是闪烁其词、举棋不定。这是因为一方面会议如期召开确实难以实现,而另一方面作为东道国,阿尔及利亚又不愿承担提出延期的责任。周恩来从谈话中得到的印象是阿方还是希望如期开会的。但当天上午,在前往亚历山大的途中,纳赛尔向周恩来转述了布特弗利卡与他会谈的内容,纳赛尔说:“布特弗利卡表示,最好推迟亚非会议,但阿尔及利亚不便出面建议推迟。”纳赛尔也同意推迟会议。^② 纳赛尔的转述终于使周恩来对阿尔及利亚的态度有了更准确的把握,也就不得不重新考虑中国的政策。同日,英联邦亚非国家重申了要求推迟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决定,熊向晖敦促他们如期与会的行动再告失败。^③ 这些事态促使周恩来改变了态度。他致电中共中央并告已经于22日傍晚前往阿尔及尔的陈毅,指出中国不能勉强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并提出推迟召开会议所要立即处理的问题及方案。^④ 其意在于建议中央停止敦促其他亚非国家如期与会的外交活动。

6月24日,中共中央复电周恩来:“以推迟举行会议比较主动,周恩来可在阿联休息几天,看看情况。”^⑤ 这一复电说明,中国的政策已经从坚决要求如期开会转变为观望。中国已经做好了会议再次延期的心理准备,但还没有放弃希望。根据中央复电的精神,陈毅于24日上午10时会见了布特弗利卡。后者率先表示:由于英联邦的亚非国家没有改变立场,原定今天举行的外长会议最好推迟24小时到48小时举行,以便再做工作。但外长会议延期的问题将在常委会上讨论,阿方不能单独决定。陈毅表示:不管东道国认为应该如期开会还是要推迟会议,中国都支持。在会谈中,陈毅反复探问阿方的态度,布特弗利卡仍不肯明确表态。^⑥ 最终,常委会会议决定,外长会议推迟到26日举行。

6月25日发生的两件事彻底消除了会议如期举行的可能性。首先,一部分英联邦亚非国家表示将不派任何代表出席会议,而另一些英联邦亚非国家虽派代表,但他们都受命要求会议延期举行,同时,没有任何英联邦亚非国家的首脑前往阿尔及尔与会。在伦敦的英联邦亚非国家外长表示,如果会议召开,他们将拒绝承认会

① 《周恩来总理同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布特弗利卡就阿尔及利亚内部局势进行会谈的谈话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7-01081-11,起止日期:1965年6月23日—1965年6月23日。

② 《周恩来总理就亚非会议推迟问题同阿联总统纳赛尔进行会谈的谈话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7-01081-13,起止日期:1965年6月23日—1965年6月23日。

③ 熊向晖:《从第二次亚非会议搁浅看周恩来光明磊落的外交风格》,第176—178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39页。

⑤ 同上。

⑥ 《陈副总理访问阿尔及利亚有关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7-01080-03,起止日期1965年6月23日—1965年6月24日。

议做出的决议。^①其次,第二次亚非会议的会场松树俱乐部当晚又发生了爆炸,而爆炸成为了延期开会的一个绝好借口。

25日,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同中国驻英代办熊向晖的一番谈话也使中国最终决定支持会议再次延期。尼雷尔尖锐地指出:“在如期去阿开会这一点上,中国政府的坚决态度和中国所进行的积极活动,超过了布迈丁政权,这已引起一些人的惊奇、怀疑、甚至不满,有损于中国和周总理本人的崇高声誉。”^②尼雷尔的谈话表明,中国呼吁如期开会的行动已经引起了一些亚非国家的不满,中国组织一个反美论坛的迫切愿望已经超出了亚非国家的理解范围。周恩来在接到了有关这次谈话的电报后,马上致电中央,据此建议中央决心延期开会,中央复电同意。^③这样,中国的政策才最终转变为支持延期开会。

26日中午,布特弗利卡邀请中国、巴基斯坦、印尼、埃及、叙利亚、马里等六国外长磋商是否延期,各国都同意延期,并且同意取消当天的外长会议,由常委会宣布延期的决定。于是26日下午常委会又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第二次亚非会议首脑会议推迟到11月5日举行,外长会议推迟到10月28日举行。^④这样,第二次亚非会议再次被推迟。

四、促使会议无果而终的阶段(1965年7月1日—11月2日)

在本阶段,中国政策主要表现为以是否谴责美国作为衡量第二次亚非会议成败的标准,原因是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升级,反对美国侵略越南和全力支持越南的抗美援朝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中心。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并没有得到其他亚非国家的支持。此外,中国关注的某些问题也没有得到满意的回应。这些因素导致中国逐渐失去了对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兴趣并决定促使会议无限期推迟。

1965年8月下旬到9月下旬,中国为第二次亚非会议又进行了两次重要的外交活动,分别是接待阿尔及利亚国务部长比塔特访华和陈毅对巴基斯坦、叙利亚、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等国的访问。

8月23日,同往印尼参加庆祝活动的陈毅和比塔特同机回到中国。24日上午,在从昆明飞往北京的飞机上,陈毅与比塔特进行了初步的会谈。由于比塔特表

^① *Incoming Telegram from American Embassy London to Department of State 6231*, June 25, 1965, RG 59, 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 Central Foreign Policy Files 1964-1966, Political & Defense, Political Affairs & Relations, Box 1826, 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 College Park, MD.

^② 熊向晖:《从第二次亚非会议搁浅看周恩来光明磊落的外交风格》,第180页。文章没有明确说明尼雷尔与熊向晖谈话的日期,但从上下文推断应为6月25日。

^③ 熊向晖:《从第二次亚非会议搁浅看周恩来光明磊落的外交风格》,第183页。

^④ 曾涛:《第二次亚非会议为何没有开成:30年前我亲身经历的往事》,第55页。

示阿政府对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邀请并没有因本·贝拉被推翻而自动取消,陈毅表示,中国绝不能同联合国代表一起出席会议,吴丹只能坐在记者旁听席上出席会议的开幕式闭幕式。^①邀请联合国秘书长与会问题成为中国与阿尔及利亚之间一个难以弥合的分歧。

25日,周恩来与比塔特进行了两次会谈。上午的会谈主要是比塔特介绍情况。在下午的会谈中,周恩来着重阐述了中国的四点立场。首先,不同意邀请古巴作为观察员;其次,不能接受吴丹作为观察员,也不会与他接触;第三,重申“一揽子”解决的方针;第四,重申反对苏联与会的立场。^②

在了解了中方的立场之后,26日下午,比塔特与周恩来进行了第三次会谈。比塔特表示,不邀请拉美国家作为观察员和“一揽子解决”问题都困难不大。但对于苏联与会问题,比塔特表示,由于担心苏联中断援助,阿方不便带头反对。而对于邀请吴丹问题,比塔特没有表态。^③这表明,在邀请联合国、苏联参会问题上中国仍然无法和阿尔及利亚达成一致。

27日晚,周恩来、陈毅与比塔特举行第四次会谈。此前,阿尔及利亚外长曾要求曾涛将吴丹关于解决越南问题的信件转交给中国,遭到曾涛的断然拒绝。^④由于此事的发生,当晚会谈的气氛愈见紧张。周恩来指出:中国问题、越南问题、印度支那问题从来就与联合国无关,现在也绝不许联合国插手,联合国插手就等于美国插手,祸患无穷。他还动情地说:“谁要是拿联合国来同我们谈,就是侮辱我们。”^⑤这样一来,中国与阿尔及利亚在联合国与会问题上的分歧愈发扩大。中国之所以仍然坚决反对联合国和苏联参加会议,不仅有过去的积怨,还与越南战争有密切关系。联合国一直试图调解越南战争,而中国认为这是美国的阴谋。中苏在援越问题上也存在分歧,中国认为苏联对越南的援助既不情愿,也不适合越南的情况,其目的在于控制越南。而苏联支持美国的和谈建议更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

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许多亚非国家都支持美越谈判,以便缓和印度支那的紧张局势,而中国认为美国提出和谈是为长期驻军越南寻找借口。中国与亚非国家在对美政策方面的分歧正在扩大。而1965年6月,巴基斯坦与印度再次因克什米尔问题发生武装冲突,导致巴基斯坦无暇他顾,中国更感到势单力孤。中国决定派陈毅访问五个亚非国家,为第二次亚非会议做最后的努力。

① 《阿尔及利亚国务部长比塔特访华简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7-00937-01,起止日期1965年8月24日—1965年9月7日。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阿尔及利亚国务部长比塔特访华来往电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204-01103-01,起止日期1965年7月24日—1965年9月1日。

⑤ 《阿尔及利亚国务部长比塔特访华简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7-00937-01,起止日期1965年8月24日—1965年9月7日。

陈毅的这次出访对于中国的决策有决定意义。在出访前夕,周恩来于9月2日和3日连续两次强调,第二次亚非会议必须点名谴责美国在越南的侵略行为,否则会议就没有必要召开。^① 这样的表态实际上为陈毅的出访奠定了基调。陈毅在访问中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9月5日,他在访问途中接受采访时说:希望这次会议将支持越南人民的斗争。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② 9月8日,陈毅与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布迈丁举行会谈。陈毅在会谈中表示,只有第二次亚非会议高调反帝,才可能迫使美国从越南撤走。陈毅还与布迈丁着重探讨了双方始终没有达成一致的邀请苏联和联合国与会的问题。陈毅甚至提出,只要吴丹讲话,中国只有采取抗议或退席的办法。而布迈丁表示,阿尔及利亚作为东道国不能明确表态不让苏联参加,这个问题只能由外长会议去讨论。而对吴丹的邀请已经发出,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和方式加以改变。^③ 中阿两国的分歧仍然没有解决。陈毅对于几内亚的访问也没有取得成果,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向陈毅表示,几内亚已经改变了过去反对苏联参会的立场,杜尔认为中国反对苏联与会的态度是建立在激进的立场之上的。^④

就在陈毅出访期间,9月13日,中国外交部向各驻外使领馆发出了中国政府关于越南问题和第二次亚非会议问题的两个备忘录。关于越南问题的备忘录提出:“支持或不支持越南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是对亚非各国反不反帝,敢不敢反帝的一个考验。”关于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备忘录表示:“越南是当前反帝斗争的焦点,所以亚非会议必须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这是会议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志,否则,还有什么必要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呢?”^⑤ 这种强硬的措辞不但没有说服亚非国家,反而使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分歧不断扩大。访问结束后,代表团在总结报告中表示:到访的亚非国家认为中国过于僵硬、过于革命、不讲究策略。因此,双方争论较为激烈,这与1964年初周恩来、陈毅访问亚非14国的情况大有不同。^⑥

鉴于陈毅出访没有取得积极成果,中国开始逐步透露延期举行会议的考虑。9

① 《周总理严斥美国玩弄和谈骗局》,《人民日报》1965年9月3日第4版;《周恩来总理关于亚非会议和南越等问题的谈话及相关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6-00893-05,起止日期1965年9月4日—1965年9月13日。

② 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18页。

③ 《陈毅副总理同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布迈丁谈话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6-01270-03,起止日期1965年9月8日—1965年9月8日。

④ *The African Response to Chen Yi's Visit, the Intelligence Note*, Sept. 30th, 1965, RG 59, 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Office of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Analysis, Files Related of Bounding I & II Afro-Asian Solidarity Committee and Sino Soviet Relations 1951-1971, Box 1, 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 College Park, MD.

⑤ 《周恩来总理关于亚非会议和南越等问题的谈话及相关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6-00893-05,起止日期1965年9月4日—1965年9月13日。

⑥ 《陈毅副总理出访马里、巴基斯坦等五国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6-01270-02,起止日期1965年9月28日—1965年9月28日。

月29日,陈毅在记者招待会上对是否按时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提出四条标准:公开谴责美帝国主义;不让联合国代表参加会议;反对苏联与会;不能干涉阿尔及利亚内政。并明确指出:“有保证开好,中国政府就赞成召开,如果没有开好的保证,中国政府就赞成等条件成熟了再开。”^①这是中国首次在公开场合正式提出有可能推迟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9月30日,在会见印尼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代表团时,周恩来也谈到了会议面临的困难,并说明中国对于是否主张会议延期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并请印尼代表团将他的意见转告印尼总统、外长,请他们考虑这个问题。^②这是中国第一次对外国谈到会议延期的可能性。

10月8日,阿尔及利亚方面通知曾涛,阿方决定于10月14日召集常委会会议,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组织工作即将再次启动。阿尔及利亚的这个举动促使中国最终做出了无限期推迟会议的决定。

10月10日,中国外交部向驻亚非各国使馆发出酉213号电报,决定力争使会议无限期推迟。电报要求中国驻亚非各国使馆约见驻在国负责人,阐述中方的看法。^③在发出酉213号电报的同时,外交部也要求曾涛立即约见布迈丁或布特弗利卡,阐述中国的态度。曾涛分别于12日和13日约见了阿外交部官员和布迈丁,而对方均表示无法接受中国的立场。^④

常委会分别于10月14日、15日,10月19日、20日和10月24日、25日举行了第九、十、十一次会议。针对这三次会议,中国不断增强会内会外的外交活动力度,但几经努力终于无法让常委会做出无限期推迟会议的决定,最终,中国不得不单方面宣布不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

对于10月14日、15日召开的第九次常委会会议,中国的立场是:第一,坚决反对做出重申如期开会的决定;第二,给其他国家考虑的时间,不强求会议做出不定期延期的决定。^⑤

在14日的会议上,阿尔及利亚方面一开始就希望通过一个如期开会的通知书,遭到曾涛的反对。外交部指示曾涛,要坚决打掉通知书并建议在20日左右再开一次常委会会议。曾涛按照国内的指示,在15日举行的会议上进行了七个半小

① 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下卷,第1124页。

② 《周总理接见印尼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代表团第1次谈话记录(谈关于第二次亚非会议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5-01917-03,起止日期1965年9月30日—1965年9月30日。

③ 《有关第二次亚非会议延期举行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7-00934-01,起止日期1965年10月8日—1965年11月5日。

④ 曾涛:《第二次亚非会议为何没有开成(续):30年前我亲身经历的往事》,《国际问题研究》1996年第2期,第48—49页;《有关第二次亚非会议延期举行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7-00934-01,起止日期1965年10月8日—1965年11月5日。

⑤ 《有关第二次亚非会议延期举行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7-00934-01,起止日期1965年10月8日—1965年11月5日。

时的争论。最后中国与阿尔及利亚达成妥协,没有对会议日期做出任何决定,同时决定常委会于10月19日再举行会议。^①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决定再次加大外交活动的力度。首先,15日,外交部指示所有驻外使馆在对外接触时不要再回避中国赞成第二次亚非会议延期的主张。对于一些友好的亚非国家,使馆可以主动说明中国的意见。其次,18日,外交部要求曾涛约见布迈丁并表示:延期举行会议不是中国一国的私利问题,而是亚非各国人民共同利益问题,同时也关系到东道国的声誉。然而,布迈丁避而不见,只由外交部秘书长予以接见。在曾涛向对方阐述了上述意见后,对方仍不能接受。^②

对于19日召开的常委会会议,中国也决定加大压力。18日,中共中央向曾涛发出指示电,明确要求把延期问题作为正式建议提出,并发出了甲、乙两份决议草案。这两份决议草案的主体部分都是相同的,即决定延期召开原定于1965年10月28日开始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会议。但草案甲只是在开头笼统地表示“目前国际上出现了一些复杂形势和困难因素”,而草案乙则在开头具体地指出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分歧。中共中央指示,如果有亚非国家联名,则提出草案甲,如无人联名,中国则单独提出草案乙。^③

在19日举行的常委会会议上,中国与柬埔寨联名提出了草案甲,但会议没有进行讨论就休会。在20日会议上,阿方表示无论如何要如期开会,而印尼、伊朗、加纳、埃及、摩洛哥为了反对中柬联名提案提出了一个新的决议草案。这一决议草案实际上是一个变相的如期开会通知书,因此遭到中国的反对。随后,曾涛又提出一个简单扼要的会议决议草案。但以上三个草案都未获得会议的通过,最后会议只是决定在24日再举行常委会的第十一次会议。然而第二天,阿尔及利亚通讯社就将印尼等五国提出的决议草案当作“常委会第十次会议的决议”予以发表。曾涛对此提出了书面抗议。^④为了澄清事实,《人民日报》于22日公开报道了这次会议的情况,还公布了上述三个决议草案,并说明会议没有通过任何决议,只是决定于24日再举行会议。^⑤这就等于将中国与阿尔及利亚等国的分歧公诸于世了。

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中国于22日和23日连续采取三项行动来促使亚非国家接受中国的意见。22日,周恩来致函亚非各国首脑,信函表示:“中国政府经过

① 《有关第二次亚非会议延期举行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7-00934-01，起止日期1965年10月8日—1965年11月5日。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曾涛：《第二次亚非会议为何没有开成（续）：30年前我亲身经历的往事》，第50页；《有关第二次亚非会议延期举行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7-00934-01，起止日期1965年10月8日—1965年11月5日。

⑤ 《亚非会议延期问题的讨论并未结束 中国代表团坚持会议应延期的立场》，《人民日报》1965年10月22日第1版。

反复慎重的考虑,认为与其不顾协商一致的原则,强行开会,造成亚非国家的分裂,不如暂时不开,还能有利于亚非人民维护万隆精神、坚持团结反帝的事业。如果硬要如期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中国政府将被迫不能参加这种导致分裂的会议。”^①同日下午,周恩来会见了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在会谈中,周恩来再次详细罗列了第二次亚非会议所面临的困难,并表示,中国绝对不会明知有陷阱还要跳下去。^②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亚非会议应当延期召开》的社论。社论指出:“须知道,延期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不会对任何人带来损失,而断送协商一致的万隆精神、破坏亚非团结、分裂亚非国家,才是亿万亚非人民所真正不可饶恕的。”^③

对24日举行的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中国决定做最后的努力。中国的策略是,如果有人建议把延期问题提交外长会议讨论,中国可以同意召开一次特别外长会议,这个会议决不能是首脑会议的筹备会议,也不能是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组成部分,它的任务只是讨论延期问题。^④这是中国所能做的最后让步。

在24日的会议上,中阿双方仍争执不下。25日,虽然曾涛提出了举行特别外长会议的建议,做了最后的妥协。但阿方仍然强行宣布第二次亚非会议如期举行。曾涛只得做出了“中国政府被迫不能参加这种导致分裂的会议”的声明。^⑤

26日,中国政府也发表了决不参加10月28日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声明。^⑥27日的《人民日报》不仅再公布了曾涛和中国政府的声明,还全文刊发了22日周恩来致亚非各国首脑的信、中柬联合提出的决议草案和常委会陷于破裂的报道。至此,中国结束了参与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整个历史进程,第二届亚非会议也最终无限期推迟,这一推就是40年。2005年4月22日至23日,第二次亚非会议在雅加达举行,但会议的主题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探讨加强两大洲在多个领域里合作的问题。

综上所述,中国对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政策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整体上体现出“反修”寸步不让,“反帝”逐步升级的趋势。中国对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政策是中国在60年代实行的“反帝必反修”、“两面开弓”外交战略的一个典型例证,也是这一外交战略在亚非国家重要的落实步骤。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59页。

② 《有关第二次亚非会议延期举行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7-00934-01,起止日期1965年10月8日—1965年11月5日。

③ 《亚非会议应当延期召开》,《人民日报》1965年10月23日第1版。

④ 《有关第二次亚非会议延期举行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7-00934-01,起止日期1965年10月8日—1965年11月5日。

⑤ 曾涛:《第二次亚非会议为何没有开成(续):30年前我亲身经历的往事》,第50—51页。

⑥ 《坚持团结 反对分裂 维护在团结反帝基础上协商一致的原则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不参加导致分裂的亚非会议》,《人民日报》1965年10月27日第1版。